

# 唐宋之际“五星占”的变迁： 以敦煌文献所见辰星占辞为例

余 欣

〔摘 要〕在中国传统星占学中，“五星占”是极为重要的一部。本文主要以辰星占辞为例，对五星占在唐宋之际的变迁做了论析。汉代至盛唐的五星占，虽然占辞庞杂，其主流性质皆为军国星占。敦煌文献《西秦五州占》的出现，表明晚唐的星占分野灾异说呈现出进一步地方化与具体化的迹象，并且道教符箓与星占的结合趋于紧密。魏晋时期，随着密教经典的编译以及波斯、粟特、印度天文术士的入华，源自希腊、罗马并经过改造的天文星命概念和技术陆续传入中国，但大举进入官方天文历法体系和民间日常生活场域，则在晚唐五代。西方的九曜或十一曜观念及以此推算行年的星命占验和禳除之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崇信，行用甚炽，外来因素深刻地融入“五星占”及相关的星曜信仰，成为“常识”和“习俗”。这一类“新五星占”与“本土五星占”成为中古以降并行不悖的两条发展主线。

〔关键词〕五星占；唐宋之际；变迁；敦煌文献

〔中图分类号〕B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873(2011)05-0070-09

〔作者简介〕余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200433

中国古代星占之学，历来被正统史学视为“左道”。治天文学史者偶有涉足，亦往往仅据传统史志和星家著述加以论列。<sup>①</sup>由于研究取向之不同，星命信仰在中古社会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过程，仪节法度在宗教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以及对普通民众思想与行事的实际影响，一般不在科学史家考察视野之内。<sup>②</sup>就唐宋时期星学进行专门探讨的是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步虚》一书，对于唐代宇宙观、星神崇拜、占星术、星占者都有许多精彩的论述。<sup>③</sup>此后一度复归于沉寂。所幸近十余年已有所改观，江晓原、钮卫星、黄一农、孟嗣徽、廖暘、赵贞、陈万成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古之星命、星占文献及图像资料的释读和论析，<sup>④</sup>为我们提供

① 例如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江晓原以天文学史研究与星占学的关系为个案，讨论了将科学史研究归属于科学或归属于历史学的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将天文学史作为科学史对待的做法，造成了一道鸿沟：在严肃的天文学史著作中，看不到星占学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看不到星占学和天文学交互作用的生动图景，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星占学是人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参见江晓原《科学史：是科学还是历史——以天文学史及星占学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吴以义则主张“作为文化史之一部的科学史”取向，《溪河溯源：吴以义科学史论文集》，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77-106页。

③ Edward H. Schafer,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④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欧洲天文学东渐发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48页；《〈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图像考辨》，《艺术史研究》第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556页；《五星图像考源：以藏经洞遗画为例》，《艺术史研究》第3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419页。廖暘《炽盛光佛再考》，《艺术史研究》第5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369页；《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版。

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但仍有不少问题迄今未能求得通解,尤其是星占学与星命信仰在晚唐、五代、宋初之际发生的关键性转变,及其与东西文化交流关系之省察,渺有及之。故笔者拟在前贤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简帛、敦煌文献为核心资料,对中古时代“五星占”的概念和技术的变迁,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而发掘其在信仰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

## 一 中国传统“五星占”的源流

金、木、水、火、土五星,先秦古籍所见中国传统名称为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或镇星)。其命名虽本于实测,五行与五星配合,乃后起之说,<sup>①</sup>然天象观察与阴阳占验关系密切,五星之变动,备受关注的其实是星占学意义,则是不容置疑的。《周礼·保章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计也。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观妖祥。”<sup>②</sup>可见观星以占妖祥的理论与技术成立甚早,上古之世便是皇家术士的职责。星占中最受关注的“星辰日月之变动”便是“日月占”与“五星占”,即《史记·天官书》正义引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sup>③</sup>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8篇、《汉五星慧客行事占验》8卷,当是以五星、客星、流星、彗星占举事宜忌的汉代古书。又有《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海中五星顺逆》28卷,亦五星占之属。<sup>④</sup>五星占不仅有专书,且卷帙达二十余卷,可见其术之繁盛。惜乎诸书皆已亡佚,无以窥见其详。

所幸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使我们得见早期“五星占”的技术细节。《五星占》是专论五星占测和五星行度的古佚书,残存木星占、金星占、火星占、土星占、水星占、五星凌犯、木星行度、金星行度部分。<sup>⑤</sup>从天文学意义而言,五星行度的记载甚为天文学史研究者关注,因其记录时间上推至秦始皇元年,比《淮南子》早120余年,被认为是用浑仪实测的结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行星观测。<sup>⑥</sup>关于五星运动的理论虽然比较简单,但表明秦汉之际对行星会合周期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奠定了基本框架。<sup>⑦</sup>不过,我们更关注的是星占学意义。张嘉凤认为《五星占》表明对于五星运行的常变的观测更为精准,基于此天文占卜才可能随之扩展,且日趋细致。<sup>⑧</sup>但何幼琦早就指出,前六章同后三章大不相同,前者是本体,是战国占书的佚文,纯系根据五大行星的变异,对于军国命运进行占卜的占术,其指导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后者一半是观测,一半是推算,错误很多,说明编辑《五星占》的术士不大懂天文学,他们是只观象,不测算,认识五星而不了解它们的行态、行度和行期,记录是向天文学家搜集和抄撮来的。<sup>⑨</sup>这一结论对于我们认清《五星占》的占书本质,是有帮助的。

《五星占》相当复杂,我们只征引其中水星占部分:

① 刘操南《五大行星命名不本于地支而本于观测说》,《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②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19-820页。

③ 《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289页。

④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64页。李零认为《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是合《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为一书,中间要点断。后二种《海中占》,与航海有关,因海中观星,视觉效果胜于陆地。见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6-177页。前说解释合理,从之。后说恐非是,笔者将另撰文详辩。

⑤ 释文及相关介绍,参见席泽宗《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中的〈五星占〉》及《〈五星占〉释文和注解》,《文物》1974年第11期。

⑥ 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考古》1976年第2期。

⑦ 曲安京《中国数理天文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⑧ 张嘉凤《天事恒象——殷周至汉初天文占卜体系的发展与演变》,祝平一主编《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01-102页。

⑨ 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年第1期。

北方水,其帝颡(顓)玉(项),其丞玄冥,[其]神上为晨(辰)星。主正四时,春分效(娄),夏至(效东井,秋分)效亢,冬至效牵牛。一时不出,其时不利;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其出蚤(早)于时为月蚀,其出免(晚)于时为天矢(及彗)星。其出不当其效,其时当旱反雨,当雨反旱〔当温反寒,当〕寒反温。其出房、心之间,地盼动。其出四中(仲),以正四时,经也;其上出四孟,王者出;其下出四季,大耗败。<sup>①</sup>

北方为水,其帝颡项云云,是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本土天文学结合的体系中关于水星的五行五方的正统叙述。类似的表述亦见于《淮南子·天文》。关于辰星之名义及所主刑德,则可与《史记·天官书》所云“察日辰之会,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曰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宿命国”互相印证。<sup>②</sup>文中称辰星为“太阴之精”值得留意。“太阴”一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马克(Marc Kalinowski)曾经总结为:建神;天神、忌宜神;治四时;配合建除之法;徙诸神之原则。<sup>③</sup>陶磊认为在《辞源》所列四个义项:月亮;太岁别称;极盛的阴气;人体经脉名之外,可以再增加两个义项:表示方位;代指辰星。<sup>④</sup>以上概括自然不错,但我们发现辰星被称作“太阴之精”往往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主要是在易占、星占、历志中,例如《京房易传》、《汉书·律历志》等,并非普通的用法。值得一提的是,帛书《五星占》的“五星凌犯”还把水星称为“小白”,则为他书所未见。<sup>⑤</sup>

秦汉时期,五星占辞的意象已极为丰富,此处我们无法备述,只指出与天下观与夷夏观相关的部分。《史记·天官书》云: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sup>⑥</sup>

五星占辞最有名的考古资料实物,自然当推1995年尼雅遗址考古发掘中,在一座汉晋时期的墓葬中清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锦织物。<sup>⑦</sup>这件织锦出现在多“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的西北边地,当与《史记·天官书》所表达之夷夏观,即星占学所蕴含之意识形态有关,绝非偶然。

在中国传统星占学中,“五星占”是很大的一个门类,各个时代的占辞非常繁杂。至唐代瞿昙悉达编集《开元占经》,系统地辑录了战国以来形形色色的宇宙论和各家星占文献,辑录了关于各种天体与天象的运行变化及其占星术判断等方面的论述,尤其是历代星占书中关于天、地、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占辞。<sup>⑧</sup>其中,仅《辰星占》便有7卷之多。五星占之重要性,《开元占经》卷18引《荆州占》有如下表述:

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于列舍,以司无道之国。王者施恩布德,正直清虚,则五星顺度,出入应时,天下安宁,祸乱不生。人君无德,信奸佞,退忠良,远君子,近小人,则五星逆行、变色、出入不时,扬芒、角怒,变为妖星、彗孛、彗扫、天狗、枉矢、天枪、天棓、揜云、格泽;山崩、地振、川竭、雨血,众妖所出,天下大乱,主死国灭,不可救也。余殃不尽,为饥旱、疾疫。<sup>⑨</sup>

① 录文参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7页。

②⑥ 《史记》,第1327页;第1347页。

③ M. 卡林诺斯基《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华学》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110页。

④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57-58页。

⑤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⑦ 于志勇《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织文初析》,《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

⑧ 陈久金《瞿昙悉达和他的天文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1985年)第4期。

⑨ 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48页。

令人惊异的是，瞿昙悉达虽然是出身于印度的天文学家，<sup>①</sup>并且编译了《九执历》，但是《开元占经》占验的思想和技术所秉承的仍是中土的传统，而看不到多少外来的痕迹，也没有出现“九曜占命”的内容。以《辰星占》卷1为例，所征引的文献虽然浩博，大体上不出甘氏、石氏、巫咸之言，《郗萌占》、《荆州占》、《天官星占》等传统星占书，《洪范五行传》、《淮南子》、《汉书·天文志》、《汉书·五行志》等经史诸子典籍以及《尚书纬》、《春秋纬》、《文曜钩》、《孝经援神契》等纬书。<sup>②</sup>其占文之内容，亦为饥荒、疫病、兵甲等有关天下治乱兴亡之军国大事，而并不用于占测个人命运。

《天地瑞祥志》题唐麟德三年(666)太史萨守真撰，是一部以祥瑞、灾异、星占、杂占为中心的专门类书。<sup>③</sup>目录所列卷3列有辰星占，虽然此卷已佚，有目无文，但从《天地瑞祥志》与《天文要录》、《开元占经》的相互关系来看，<sup>④</sup>应该也是同类性质的东西。

宋代以后，历法改革与天象观测及星占之间关系的新动向，很值得关注。对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中“验历”的考察以及宋代《乾象历》利用历代五星天象校验历法的考证表明，以占星为目的的五星天象研究，在历法发展到一定程度，比较好地解决了日、月运动问题之后，成为推动历法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技术因素。历法的目的就是要对星占关注的天象尝试进行把握，这种把握必须要以星占的具体观测为依据。中国古代五星观测，既是星占的内容，也是历法的内容，历法与星占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sup>⑤</sup>

## 二 敦煌占书中的“五星符”

敦煌文献中有七件唐代星占佚籍《西秦五州占》写本，内容包括五星占、日暝占、日斗占、日耳占、日食占、日晕占、色气占、月光不明占以及五星符等九项内容。其中多件存有“五星占”和“五星符”，内容大同小异。S.2729V末题“大蕃国庚辰年(800)五月廿三日沙州口”，可知在吐蕃领沙州期间，《西秦占》已经成立并有抄本流传。又P.2632题记“手诀一卷，咸通十二年(871)八月廿五日于晋昌郡写记”，其时河西地区已为张议潮收复，《西秦占》仍然在流传，而且从冠以“手诀”一名推断，《西秦占》似乎已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实用占星手册。总之，由题记不难推断其大致盛行于晚唐五代时期。

我们试以较为完整的P.3288为例，略作分析。此卷首题“立(玄)象西秦五州占第廿二”，接着分门别类记载了西秦五州：武威、张掖、酒泉、晋昌、敦煌地区的天象预言和占卜，其基本性质应是主要用于河西诸郡的地方性星土占书。<sup>⑥</sup>此五州分别与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分野关系。如果五州之中一旦出现“破城坏邑”、“五谷不熟”、“粟贵虫食”、“城下有贼”以及“人民相煞”的灾祸，只要大将“举贤良，用忠直”，并“取本州符法攘之”，即可大吉。此处敦煌所对应的正是辰星，占军国的分野和个人本命祈禳所绘星神之一恰好一致，恐怕只是巧合而已，并非普适规

① 晁华山《唐代天文学家瞿昙墓的发现》，《文物》1978年第10期。

② 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第389-395页。

③ 东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藏贞享三年(1686)抄本，笔者曾对原本做过详细的调查。前人相关研究参见：太田晶二郎《〈天地瑞祥志〉略说——附けたり、所引の唐令佚文》，《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1册，吉川弘文馆1991年版，第152-182页；中村璋八《天地瑞祥志について》，《日本阴阳道书の研究》(增补版)，汲古书院1985年版，第503-509页；水口干记《日本古代汉籍受容の史的研究》，汲古书院2005年版，第177-406页；水口干记、陈小法《日本所藏唐代佚书〈天地瑞祥志〉略述》，《文献》2007年第1期。

④ 游自勇认为“如果我们把《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和《开元占经》的目录作一个对比，会惊奇地发现《开元占经》似乎是综合了前两部书的内容，在结构编排上更加细致和清晰。”见游自勇《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前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页。

⑤ 孙小淳《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5卷(2006年)第4期。

⑥ “星土占”为星占领域中分野占的分支之一，是中国星占最古老也是重要的门类。参见李勇《从“〈左传〉所言星土事”看中国古代星占术》，《天文学报》第32卷(1991年)第3期。

律。在后面的“五星符”中,敦煌对应于岁星,而晋昌则对应于辰星,前后抵牾,大概是抄撮于不同写本之故。以P.2632为底本,P.3288为参校本,录文如下:

武威荧惑(符)此符,所有日月食晕耳开斗及溟云气,临城恶灾,占之者即须用五星符,朱书,桃木七寸,书此符安之吉。

张掖太白(符)置四门厌襪。大将须清斋沐浴,着新净衣,手自执符丁(钉)在四门上,入土二三寸。咒:我是所由,专守此城,大吉。

酒泉镇星(符)城中苍生,我视之如赤子,我今占见日月晕食及恶气色,注我城中流亡,辰夕忧惶,寝食不安,伏

晋昌辰星(符)愿具之五星,我知之了,各摄恶气,我自修善,转祸为福。咒讫,大将须三七日用良贤,召臣取义。

敦煌岁星(符)布恩恤下,矜孤敏(愍)穷,思下士如渴。用此李(礼)攘之,事所有灾乱,便自消灭,更不为灾。<sup>①</sup>

此节文字不多,但实用的细节应有尽有:不仅画有符及相应的咒语,并且还开列了主事的“大将”斋戒沐浴、着新衣,亲自执符钉门上等行事程序,还有“用良贤,召臣取义”等修善方略。不过,文中所示基本上是道教的符咒解除方术,看不出有外来星占的痕迹。如姜生所论,所谓道符乃是一种蕴义甚丰的神学符号,其造作之思想材料,主要为中国古老的A 阴阳、B 五行、C 五方、D 三才、E 易卦、F 天干地支、G 道教的重要概念文字,等等。构图形式主要为1 象形、2 复文、3 云篆、4 八卦的卦象符号、5 以及这些文字符号的夸张变形或离析等等。<sup>②</sup>本符的造作手段也不外乎此。大致可以辨认为汉字变体符号的有:石、召、厌、召、鬼、品、月、口、日、田、鬼、九、文、周、足、日、太、鬼、口、四、九真等。其中不少构成方式,都可以从陕西户县汉墓出土的曹氏朱书解除瓶上所画二符和河南洛阳西郊东汉地层出土的解注瓶上所画三符找到例证或渊源。<sup>③</sup>尽管我们无法通解每一个符号的含义,但其基本语义是清楚的,即使用符咒进行祈请,希求殄扫鬼魅恶气,刀兵灾殃,护佑全城老幼,转祸为福。这与咒语及占书整体内容完全一致。

可与本件进行比较研究的是Ch. Ivi. 0033《计都星·北方辰星供养陀罗尼符》。画面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两星神的立像,下段为符箓和愿文。右侧像为计都星,男性、披发、裸上身,拱手立于绿色的云朵之上,但云朵已经几乎全部剥落。左侧有朱书榜题“谨请计都星护身保命,弟子一心供养”。左侧像为北方辰星,女身,着红色云肩大衣,内着裙装,左手执札,右手持笔,立于红绿两色祥云之上,绿色云朵大半已剥落。左侧朱书榜题“谨请北方神(辰)星护身保命,弟子一心供养”。下段右侧为朱书符箓,占了3/4的篇幅,符箓末行右下侧有墨笔符号。左侧为愿文,三行,亦为朱笔,文字曰“此符陀罗尼符,带者得神通,除罪千劫,十方诸佛惣在目前。去者无不吉,利达。一世得人恭敬,功得(德)无比护净。急急如律令。”末行有朱笔花押。相比而言,Ch. Ivi. 0033的结构更为复杂,但在星占与符箓结合的层面上,与《西秦五州占》的构成法则应该有共通之处。<sup>④</sup>道教符箓之所以能与陀罗尼结合,是因为与陀罗尼本身具有神秘经咒性质,两者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① 相关研究及录文,可参Carole Morgan, “Mayhem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Cahiers d'Extrême - Asie*, 11 (2000), pp. 183-215; 刘永明《S. 2729 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赵贞《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文献》2004年第1期。

② 姜生《道符结构、语义及功能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

③ 上述早期道符的研究,参见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略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道符》,《考古》1998年第1期。

④ 笔者试图通过文献与图像互证的方法,对其文本结构和图像程式,从信仰实践中的功能和效用层面进行分析,并对相关星命概念、星占技术和星神崇拜做了详细的考证。着重于考察解除方术、道教斋醮符箓与密教星神供养祈禳仪式如何汇摄,揭示星命信仰在中古中国宗教社会史上所呈现的繁复面相和多维意义,并对所涉及的东西方天文学和占星术的交流问题,从文明的融铄与创制的角度做了诠释。参见拙文《天命与星辰:以敦煌〈星供陀罗尼符〉为例解析中古星命信仰》,待刊。

此外，还有专门的炽盛光降诸星宿吉祥道场，功能与敦煌的“五星占”和“五星符”相同，都是用于禳除分野之灾。《宋高僧传》卷30《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

释无迹，姓史氏，朔方人也。……光启中传授佛顶炽盛光降诸星宿吉祥道场法，归本府，府帅韩公闻其堪消分野之灾，乃于鞠场，结坛修饰，而多感应。<sup>①</sup>

释无迹俗姓史氏，当为入华之粟特人，其精擅于炽盛光降诸星宿道场法，或与此出身有关。

### 三 “九曜推命”与“新五星占”的兴盛

《刘子》卷五《命相》云：

人之命相，贤愚贵贱，修短吉凶，制气结胎受生之时。其真妙者，或感五星三光，或应龙迹气梦。降及凡庶，亦禀天命，皆属星辰，其值吉宿则吉，值凶宿则凶。受气自始，相命既定，则鬼神不能移改，而圣智不能回也。<sup>②</sup>

傅亚庶认为这一宿命思想乃承袭《论衡》、《潜夫论》而来。<sup>③</sup>按，中国传统星学重在军国大事，以生辰值宿占验个人吉凶祸福，并非固有之术。<sup>④</sup>况且本土星学诸家，向无恶曜之说。由此可知，外来生辰星占学早在南北朝甚至东汉时期即已传入中国。<sup>⑤</sup>然因史料所缺，难窥其详。有唐以降，以生日星辰占断吉凶之辞，屡见于韩愈、卢仝、杜牧、司空图、杜光庭等著名文士之诗文，可见在知识阶层中已有广泛的影响。可惜这些材料一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至新近方有学者据以讨论西方星命学在中古中国的流传与命运，进而试图揭橥其在构建欧亚大陆精神文化史之重要意义。<sup>⑥</sup>

计都和罗睺，是两个假想的天体，与七曜（日月、五星）共同组成九执，<sup>⑦</sup>再加紫炁、月孛为十一曜。这些名称和概念来自西亚和印度，伴随摩尼教、密教经典及相关的天文历法、星占的东渐而传入中国。关于其起源及入华过程，前人已经做了细致的考证和阐发，<sup>⑧</sup>以伯希和、沙畹、王重民、饶宗颐所论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伯希和、沙畹指出“九曜之说，盖由此二历（《九执历》和《大衍历》）输入中国，印度天文家名九曜为 navagrah，乃合日月五行星及假定之龙首（Rahu）龙尾（Ketu）二星而成。……惟吾人确知者，西亚及印度已知之九曜，于八世纪时输入中国”。<sup>⑨</sup>王重民曰“《七曜历》之最初形式，盖用摩尼教所用曜名，佛教所说吉凶，复杂以华俗而成，本与历法无关，而纯属于星占学者也。”<sup>⑩</sup>饶宗颐据 P. 4071《康遵批命课》申论“七曜”有由摩尼教传入和中国本土“七政”两个含义，二者不可混同。<sup>⑪</sup>

来源于印度和粟特的九曜占星之术影响逐渐扩大，并在晚唐五代之时渗入官方天文历法体系

① 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2页。

②③ 傅亚庶《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0-241页。文中“五星三光”之“五星”，底本（民国十三年海宁陈氏景明刻本《刘子袁注》十卷本）原作“五行”，校释者理校为“五星”。王叔岷撰《刘子集证》（底本为涵芬楼影印道藏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2页）则不改，今从傅校“序言”，第4-5页。

④ 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第277-282页。

⑤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⑥ 陈万成《杜牧与星命》，《中外文化交流探源：星学·医学·其他》，第1-24页。

⑦ 关于九执的考证，参见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第121-128、175-179页。

⑧ Édouard Chavannes et Paul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Dixième Série, Tome XVIII, No. 3 (1911), pp. 499-617; Onzième Série, Tome I, No. 1 (1913), pp. 99-199; No. 2 (1913), pp. 261-394; 叶德禄《七曜历入中国考》，《辅仁学志》第11卷（1942年）第137期；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133页；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03-206; 薮内清《天文学·西方传来的占星术》，《增补改订中国の天文历法》，平凡社1990年版，第177-191页；Yabuuti Kiyosi, “Researches on the *Chiu-chih li*: Indian Astronomy under the Tang Dynasty”, *Acta Asiatica*, no. 36 (1979), p. 7-48. 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简介》，《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1982年版，第771-793页。

⑨ 伯希和、沙畹之说偏重于印度历法对中土之影响，而未及于星占和密教。

⑩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第127页。

⑪ 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选堂集林·史林》，第771-793页。

之中,以至无论是官颁的“大历”还是民间行用的“小历”,九曜注历都已成为“恒式”。尽管罗睺、计都、紫炁、月孛(合称为“四余”)是否应列入官方历法的一部分,围绕其存废问题的激烈争论,五代以后直至前清时期一直绵延不绝,从敦煌出土具注历看,四余入历注,的确是当时的普遍现象。<sup>①</sup>

诸曜对于星命学的影响及其具体的运用,主要体现于“九曜行年法”中。“九曜行年”是一种以年岁为据而将命运与九曜联系起来的推命术。根据它的原理和规则,世人的命运每九年一个周期,九年之内随着年岁与九曜的依次更替,人的命运也相应地发生改变。这种推命方式,唐代已经相当流行。但差不多同时,九宫、八卦等命理术语渗入进来并成为九曜推命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系统的原理表述见于《梵天火罗九曜》。此经所述九曜星占事项主要包括九曜真言和星神图像。<sup>③</sup>

随着外来九曜推命术的传播和影响日益扩大,传统的“五星占”技术系统虽然仍在延续,但是在民间,影响更大的是和个人天命与行事宜忌紧密相关的新的五星占验法,我们姑且称之为“新五星占”。同样以辰星为例,民间社会在名称上开始兼用本土的辰星和外来的曜星,用以占验生辰命运、流年和日常行事吉凶。这一趋向的展开,应该是与密教经典的翻译和流布有关。在早期密教经文中,皆依照中国习用本名译作“辰星”或“水星”,但在《宿曜经》中不但讲述了七曜所对应每周七日的行事宜忌,还罗列了胡名、波斯名、天竺名:

夫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有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密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故今列诸国人呼七曜如后。

……水曜辰星,胡名哇(丁逸反),波斯名掣森勿,天竺名部(引)陀。……

辰星直日:其日宜入学及学一切诸工巧皆成。收债本利具获。割甲、剃头、远行者则宜。伏怨敌。不宜修造宅舍。遇战,敌勿先斗。看卜问囚,必谩语作誓并凶。被禁自出,失物及逃走必获。其日生者,烧病、不孝,妨财物。长成已后,财物自足,有智长命。能言语,有词辩,得人畏敬。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其年江水泛滥,百物不成,加寒。若此日月蚀并地动,岁多饥俭。<sup>④</sup>

胡名即粟特名。水星的胡名还原成粟特文(Sogdian)为 Tir,波斯文(Persian)为 Ohehar sumbad。<sup>⑤</sup>盖中古波斯语系的东支粟特语和西支巴列维语(Pahlavi)称呼有异,故汉文音译名亦不同。文中有“若五月五日遇此曜者”之语,还有“裁衣占”等,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土特色,提出《宿曜经》在汉译及注解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汉化处理的看法。<sup>⑥</sup>从经文总体分析,当系杂糅伊朗-印度-中国占书而成,所谓“直日”的吉凶宜忌确有比较浓重的中土色彩,但其主体仍是西方占星术,即使看上去属于中土的部分仍有其外来文化渊源,中国因素不应过于夸大。

敦煌文献 P. 3081《推七曜日吉凶法》,此卷首尾皆残,包含内容芜杂,既有属于禄命类的“七曜日生福禄刑推”,又有“七曜日忌不堪用等”、“七曜日得病望”、“七曜日失脱逃走禁等事推”等吉凶杂占,可与《宿曜经》的诸曜直日行事宜忌互相印证。行事吉凶部分,先列七曜之胡名,次加释义,复罗列此日宜忌,系总言之,然后分七大事类项,细说每日吉凶,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新宅、设

① 详见拙文《敦煌文献与图像中的罗睺、计都释证》,《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即刊。

② 参见赵贞《“九曜行年”略说——以 P. 3779 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22-35页。

③ 吕建福认为此经除数个星名、真言为译文外,其余均属杜撰,其用语亦类道教,尤其是天象依传统分野,与一行依山川河流分野的方法相矛盾,可证其非一行之作。参见吕建福《一行著述叙略》,《密教论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页。江晓原、钮卫星则认为正文极有可能的确出自一行的手笔或传授,但篇末经过后人补记,最早的补记发生在天宝十载(751)。参见《欧洲天文学东渐发微》,第159-173页。笔者认为此经不少内容可与敦煌文献互相印证,未必全然为伪作,虽亦无法断言必出自一行之手,其系晚唐以前之密教文献,则应无疑。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398-399页。

⑤ Édouard Huber, “Termes Persans dans l’astrologie bouddhique chinois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VI (1906), pp. 39-43.

⑥ 李辉《〈宿曜经〉汉译版本之汉化痕迹考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斋供养、裁衣、冠带、沐浴、剃头、合和汤药、疗病、出行、兴易等。<sup>①</sup>今仅摘录其中几条与辰星（胡名即粟特名为“喃”或“啞”）相关者以窥一斑，“七曜日忌不堪用等”：“喃日不得出行，未曾行处不合去，冠带、沐浴、着新衣，凶”；“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喃日出行、兴易，失财物。上官失利，无成益”。

另一件类似的文献为 P. 2693《七曜历日》，此卷与 P. 3081《推七曜日吉凶法》不同之处在于：不是一总论列七曜之名义及特征，然后分事类叙述每日吉凶，而是以七曜为纲，每纲下有长达八行的注解，然后按十二地支分为十二目，即所谓“名宫”，每“名宫”下注明“美食”、“忧疹”、“称心”、“丰钱”等名称，然后列诸事吉凶。现将其中“喃日”之注解校录如下：

喃日 直辰北方壬丑水者。宜官，参谒官府，修伽蓝，纳弟子，修船棧，造营起首，交关，买卖，和婚，定礼，入学，受业，抄写，出行，兴易，奸私，沐浴，剪甲，裁衣，阴（阳）卜筮，医药，符咒，看病，服药，着服，殡埋，俱吉。有争竞（竞）入，无所畏，此日不宜先发人事，他后应之，虚矫作诳，咒誓一出，不宜官，修宅掘墓，造酒，结朋侣，合群牧，放债难获，沐浴（发），着衣服，结婚娶，强暴，行李，修造，裁衣，陈谋计，充保识，纳财，买卖，病者难除，禁者易出，逃者难获，失者觅得。此日闻不善消息，后必涉虚。斗（闻）恶事，说却恶散；闻好事，秘之福来。此日生男女，令人爱乐，性多虚诳，能言巧语，好明经典，得人畏敬，多患疹，妨父母，损家资，长成足财物智虑，短命，若五月五日遇此日，其多江河泛溢，百物薄熟，冬加寒冷，如日月被蚀及地动，若逢阵敌，宜着碧衣、碧瓔拂，吉。

本件文书虽然纲首标“喃日”，但注解行文似乎完全是中国本土的风格，而且文中有“讼三宝求福”（第25行）、“修伽蓝”（第65行）、“修功德，持斋戒”（第86行）、“远行度磧西”（第101行）等字句，使我们猜测这件文书很有可能是敦煌当地的术士自己编撰或以某一占卜书为底本改编的。

辰星用于推禄命的文献，生辰占卜的总论，主要见于前揭 P. 3081《推七曜日吉凶法》中的“七曜日生福禄刑推”：

喃日生人，法合明净，爱香花，装束解（鲜）洁，不孝顺，善书算，足伎艺术，禄至三品，多被不坚及得贵人钦仰爱重，足道心，多分出家。命中寿。若断回味，不杀生，即得上寿。妨数妻，若二妻同居则不好，亦妨男女，纵有只得一子，宜教他人养之大吉。

此处所述喃日生人之性格特征及行事吉凶，颇有水星神的影子，可与前引《宿曜经》、P. 2693《七曜历日》互为印证。

论流年吉凶的，则有 P. 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此卷首全尾残，首题“推九曜行年容（灾）厄法”，存文字42行。前一部分是据行年至某曜来判断命运，后一部分与推九天宫行年灾厄法有关。黄正建认为此件文书的底本原为圆形的图，岁数成规律排列在四周。这是很有洞见的看法。<sup>②</sup>法国学者马克首先将文书与佛经《梵天火罗九曜》联系起来，做了颇具启发性的比较研究。<sup>③</sup>卷中辰星占辞云：

北方喃、水、辰星，行年至此宿者，是北方辰星也，一名鼈，二名喃星。三岁、十二、廿一、卅、卅九、卅八、五十七、六十六、七十五、八十四、九十三。其星周回一百里。若临人〔命〕，注阴私口舌，盗贼牵唤，此年宜祭北斗吉。

如前所述，《推九曜行年灾厄法》与《梵天火罗九曜》具有同源关系，后者关于喃星的表述是：

以中夏之月用油祭，向北方供之。年三、十二、二十一、三十、三十九、四十八、五十七、六十六、七十五、八十四、九十三，少吉。

行年至此，宿名北辰，一名鼈星，一名滴星。周回一百里，属燕赵之分野。若临人本命，主

① 参见拙著《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0—271页。

②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4页。

③ Marc Kalinowski (ed.),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Une 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3, p. 239, 268.



阴愁口舌 盗贼牵唤。其神状妇人 头首戴猿冠 手持纸笔。国王以仲夏之月用油祭 宜醮北斗 穰之。数此十二宫 从生月下一宿为一日 左数至生日止 即知也云云。已行无 人命属游咸天 百事不成 男不宜官 女不宜夫 忌四月丙戌日。

《梵天火罗九曜》较之《推九曜行年灾厄法》提供了更多信息: 其一是关于辰星分野 这是中国传统星占的基本内容; 其二是关于辰星神状貌描述和以油醮祭的仪轨; 其三为行年的推算法。

“九曜行年”不仅有专门的占卜书 而且进入具注历日 表明它已成为便于民众自我推算和祈禳的实用工具。同样以 S. 612《大宋国太平兴国三年(978) 戊寅岁应天具注历日》所载水星条为例:

水星: 三岁、十二、廿一、三十、三十九、四十八、五十七、六十六、七十五、八十四、九十三。

水星北方主 沉沉足计筹。男子灾由( 犹) 可 大忌妇人忧。<sup>①</sup>

除了罗列岁数外 还有利于记诵的五言歌诀 充分体现了在信仰实践中作为民间实用文本的特征。

## 四 结语

《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 序二十八宿 步五星日月 以纪吉凶之象 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sup>②</sup>在官方天文星算之学中 五星之运行、变动 乃历法编纂常用要素 且常以之占验国运、人主、年成、水旱、刀兵、疾疫等事关天下兴亡的大事 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故在中国传统数术知识体系中 “五星占”为最居前之一部。<sup>③</sup>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史记·天官书》、《天地瑞祥志》、《天文要录》、《开元占经》等天文占书来看 汉代至盛唐时期的五星占 虽然占辞繁冗芜杂 其主流性质皆为军国星占。

唐宋之际 “五星占”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动向: 一方面 敦煌文献《西秦五州占》的出现 显示传统五星占在晚唐发生了一些变异 主要表征为星占分野灾异说的进一步地方附着化 谶言更为具体化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道教符箓与星占的结合趋于紧密。这一变化或许与道教在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建构及地域社会聚合所发挥的纽带作用有关。另一方面 在此之前 随着密教经典的编译以及波斯、粟特、印度天文术士的入华 源自希腊、罗马并经改造的天文历法、星命星占的概念和技术 早在魏晋时期已陆续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晚唐、五代、宋初 西方的九曜或十一曜的观念及以此推算行年的星命占验和禳除之术 大举进入了官方天文历法体系和民间日常生活场域 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崇信 从而使得“五星占”及相关的星曜信仰深刻地渗入了外来的因素。人们普遍相信五星中的恶曜和其他星曜对命运流年与行事吉凶有着性命攸关的影响 绘制相应星神的图像 对其进行供养 则可以禳除或削弱来自星界的灾厄。但是传统的“五星占”并没有消亡 也没有被替代。作为“九曜术”的一部分并具有生辰星占学特质的“新五星占” 与军国星占学色彩浓厚的“本土五星占” 成为中古以降中国星占学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主线。

( 本文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中古时代东亚博物学研究: 以海外所藏稀见写本为中心”及上海市曙光计划“唐宋祥瑞思想研究”成果之一 系在提交 2010 年 10 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佛教、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D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Oct. 8 - 10, 2010, Princeton University) 论文“Buddhism, Daoism and Astrology in a Medieval Chinese Talisman”的部分章节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中文版初稿曾在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第 25 次 workshop 上宣读 得到各位同仁的指教 谨致谢忱! )

( 责任编辑: 初 阳)

① 录文参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520 - 521 页。

② 《汉书》,第 1765 页。

③ 李零指出 两汉盛言灾异 故在《数术略》中 “数术”是以属于“星算类”的“天文”、“历谱”、“五行”三类排列最前 门派最多 地位最重要。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7 - 8 页。

“Xi Zi Sun” that largely appeared on the bronze ware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materials, it concludes that all the bronze wares that had the epitaph on it implied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offered sacrifices or their earliest ancestors were born with heaven as the father.

**Is it “Guangwu” or “Shizu”? – On the reference of the Tang taboo in the proof – reading text of Hou Hanshu**  
**JI Zhong-ping**

With the aim of recover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Fan Ye’s book,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 pattern, reveals how the change of “Shi Zu” into “Guang Wu” was made when Fan attempted to avoid taboos related to Li Shimin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in Hou Gan Shu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On the Basic Strategy of Cao Cao Group towards Rich Families—Mainly to win over**  
**ZENG Wei-hua ,WANG Mian**

In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Cao Cao Group emerged among the warlords and were successful both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in politics. Some regarded C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or and stood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ich families. In fact, the basic strategy of Cao towards the rich was to “win over”, as the social position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rich families were irreplaceable. That Cao cracked down on some of the celebrities and great families was out of the need of autocracy and did not mean that he was the rich’s opposite.

**The Transition of Wu Xing Zhan at the Tur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Focusing on the divination records in literature of Dunhuang**  
**YU Xin**

Among the ancient Chinese books about Astrology, the “Wu Xing Zhan” (Planetary Astrology) was of extreme importanc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divination records of Chen Xing and analyzes the transition of planetary astrology at the tur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western divination concepts and methods including Jiu Yao (nine luminaries), Shi Yi Yao (eleven luminaries) were widely spread and used in China. The new planetary astrology and local planetary astrology became two development lines since mediaeval times.

**On the Letter from Gu Yanwu to Wang Hongzhuan that was Collected in Jiu Ge Tang**  
**QIN Zhen**

There was a letter collected by a person surnamed Tian in Xi’an, and few records but relevant documents about the letter were not found.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letter was written in the winter of 1679 by Gu Yanwu in Taiyuan to Wang Hongzhuan. The letter mentioned something that was not known much by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time, place and people mentioned in the latter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later researches who engage in relevant study.

**Incense Hall: Consanguineous 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 the Building History of Que Shengzong’s Family in Shi Cang Village in 1710 –1850**  
**WANG Yuan**

This paper takes the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 development and houses construction of Que Shengzong’s family in Shi Cang village,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as the clue, explained the